

试论陆贄对韩愈及唐古文运动的影响

沈时蓉

陆贄(754—805),字敬輿,嘉兴(今属浙江)人,中唐时期著名的宰相,卓越的政治家,也是应用公文写作的大手笔。收入其《翰苑集》的一百四十一篇文章,都是代皇帝起草的制诰诏书和上给皇帝的奏章奏议,均属应用公文。唐代古文运动之前,唐朝的一切应用文字,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牒,一般都是用四六骈文写成,陆贄当然也不例外。古文运动兴起后,骈文同古文判若水火,两派作家互相攻讦,不遗余力。但陆贄这样一位骈文作家,却受到历代古文家高山仰止般的尊重。由宋至清,蜚声文坛的大文豪们都对陆贄推崇备至,许多著名评论家屡屡将陆贄与古文大家相提并论。如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陆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欧阳修)之实。”①苏轼在《居士集序》中说:“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贄。”②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诗云:“文章韩杜无遗恨,草诏陆贄倾诸公。玉堂端要直学士,须得僧州秃鬓翁(苏轼)。”③桐城派大家曾国藩更是明言:“陆公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④为什么一位骈文作家能同古文大家相提并论?陆贄同古文运动有什么关系?清人赵翼的评论透露出了个中消息。他说:“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散文,其胜处,有先秦两汉之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又如陆宣公奏议,虽亦不脱骈偶之习,而指切事情,纤微毕到,其气又浑灏流转,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此岂可以骈偶少之?此皆在愈之前,固已有早开风气者矣。”⑤这说明,唐代古文运动兴盛之前,有一个理论上、创作上的准备时期,陆贄也是准备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并对韩愈及其古文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一位骈文作家,陆贄到底在哪些方面影响了韩愈及其古文运动?这正是本文试图具体探讨的问题。

一、师生情谊与人格感召

说到影响,首先得谈到陆贄同韩愈之间的师生关系。陆贄比韩愈大十四岁。唐德宗贞元八年(792),陆贄知贡举,慧眼识人,选拔韩愈成进士。在此之前,韩愈已投考进士三次,皆落选。这次得中,韩愈对陆贄自然十分感激。唐代举子皆视座主为老师,韩愈对陆贄亦十分尊敬。在《与祠部陆员外书》中,韩愈曾谈到此事:“往者陆相公司贡士,考文章甚详,愈时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陆之得人也。其后一二年,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由梁补闕肅、王郎中融佐之。梁举入人无有失者,其余则王皆与谋焉。陆相之考文章甚详也,待梁与王如此不疑也,梁与王举人如此之当也,至今以为美谈。”⑥文中,可以见出韩

愈对陆贽的一片景仰之情。但稽考史实，韩愈同陆贽之间并无私人接触。因为在韩愈考中进士以前，陆贽地位很高，韩愈无法攀附。而韩愈考中进士之后两年，陆贽即遭权臣排挤而被贬官。据本传记载，陆贽在贬所忠州十年，“常闭关静处，人不识其面，复避谤不著书”。直到永贞元年（805），顺宗即位，才遇赦被召，但诏书未到而贽已死。在此期间，韩愈同陆贽更不可能接触了。虽然韩愈同陆贽没有直接交往，但韩愈对陆贽的人格十分景仰。在韩愈撰修的《顺宗实录》中，他对陆贽的评价很高，一则赞其劝说德宗“引过罪己，以感人心”，从而平息叛乱之功；二则誉其“知礼部贡举，于进士中得人为多”之绩，三则称其改革吏制，“始令吏部每年集选人”之政，至推为“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称之”。在评述陆贽与窦参、裴延龄的斗争时，韩愈完全站在陆贽一边，为陆贽昭雪辩诬。韩愈还总评陆贽说：“贽之为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于天子，长养成就之，不敢自爱，事之不可者皆争之。”^①陆贽这种为了“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②、“事之不可者皆争之”的精神，对韩愈一生行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韩愈“上书极论宫市”、“谏佛骨”、“宣抚王廷凑”等等举动，皆可视为陆贽精神的折射。

二、“贵本亲用”与“文以明道”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评说：“陆宣公文，贵本亲用，既非耆儒之迂疏，亦异杂霸之功利。”所谓贵本之“本”，就是以儒家传统的仁义道德为根本；所谓亲用之“用”，就是切合当时当代的政治功用。刘熙载还认为：“陆宣公奏议评以四字曰：正实切事。”这也是指陆贽写的文章立论正确，内容充实，言之有物，切合时事。这些评论是符合陆贽所写的大量应用公文的实际的。陆贽在朝廷任职期间，是一个多事之秋。皇帝昏庸，刚愎自用，藩镇割据，兵变频仍。陆贽冒着触怒龙颜、身遭贬斥的危险，针对当时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各种行政弊端，写下了大量公文，提出了自己正确的主张。翻开《翰苑集》，其中的每一篇奏议都是针对朝廷面临的急务而发，绝无矫揉造作、空疏不实之言。如《奉天论奏当今所切务状》^③、《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论事状》^④等，分析导致朱泚之乱的原由主要是皇帝壅蔽塞听，“上下之情不通”，规劝皇帝“以诚信为本”，“接下从谏”。《论缘边守备事宜状》^⑤针对当时西北边境将帅名目太多，统制不一，而士兵不习边事，训练无素，乃致防务空虚，无以应敌的情况，提出了加强守备，以防侵略的切实措施。陆贽的奏议文章虽然是用骈体写成，但是他并不象那些作文字游戏的骈文作家，他决不让形式成为表达思想的桎梏，而是在骈文的形式下，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政治、经济思想，既表现了他丰赡的学问修养和卓越的艺术才华，又表现了他对当时各方面问题的真知灼见。陆贽这种“贵本亲用”、“正实切事”的文风，不仅对于纠正六朝以来文坛上泛滥成灾的空虚浮华的风气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而且也从文章内容上给古文运动以积极的影响，与韩愈“文以明道”的理论主张，在实质上是相通的，即文章必须言之有物，内容充实，以强调、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来反对六朝骈文中的空洞无物的形式主义文风。

“文以明道”是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石。韩愈第一次提出“修其辞以明其道”的主张，是在贞元八年所写的《争臣论》^⑥中。在韩愈之前，独孤及提出过文章“本乎王道”的观点^⑦，梁肃提出过“文本于道”的主张^⑧。可见，“文以明道”并非韩愈的发明。韩愈比他的前辈

进步之处，是在把要明的道同社会现实、社会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根据儒家的道来阐发他所要宣扬的社会政治主张。韩愈明道的政治目的主要有两条：一是推尊儒家思想，反对佛老学说；二是强化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这种具有实用目的的明道主张，同陆贽切合当时当代的政治功用而写作，即“亲用”的写作态度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韩愈要明之道的具体内容，其实就是仁义。他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⑮而陆贽所写的文章正是在“就仁义上说事”^⑯。如贞元八年，河南、河北等四十余州大水，溺死者二万余人。而德宗却认为损失殊小，若救恤百姓，恐有奸人趁机欺诈。陆贽接连上《请遣使臣宣抚诸道遭水州县状》^⑰、《论淮西管内水损处请同诸道遣宣慰使状》^⑱二文，敦促朝廷遣使前往灾区救济百姓。《论度支令京兆府折税市草事状》^⑲、《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⑳等为百姓请命、替百姓说话的文章，确实是“就仁义上说事”。《新唐书》本传赞语说：“观贽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这种以儒家传统的仁义道德为根本，即“贵本”的写作态度，与韩愈“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的明道主张实质上也是相通的。宋人胡寅说：“陆贽之师承不可考，然所学甚正。观其陈轻重之义，破反道之说，此固邹鲁正传秦汉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坚固，议论端实，猷为通达，而不畔于道也。”^㉑陆贽的文章“破反道之说”，“不畔于道”；韩愈的文章“修其辞以明其道”，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三、“真意笃摯”与“不平则鸣”

说起明道之文，人们总觉得是一副道貌岸然、冷冰冰的模样，毫无情感可言。陆贽写的文章却不是这样。他写的尽管属于应用文字，但他把自己对国家、对君主、对人民的一腔真实感情，贯穿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力求以情动人，以理服人，避免空洞说教。王夫之评说：“故修辞而足以感人之诚者，古今不易得也，非陆敬輿其能与于斯哉？”^㉒四库馆臣评说：“贽文多用骈句，盖当日之体裁。然真意笃摯，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㉓这说明陆贽的文章之所以具有“修辞而足以感人之诚”的效果，是因为他的文章感情“真意笃摯”的缘故。如陆贽上给唐德宗的《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㉔，就是一篇感情真挚的代表作。“琼林”、“大盈”原是专供皇室私藏财物的两座金库。建中四年（783），泾原军队叛变，叛军将“琼林”、“大盈”二库财宝抢掠一空。德宗仓惶出逃奉天后，喘息初定，首先却想要利用各地贡物来恢复这两座金库。陆贽认为，将士戍守之功尚未封赏，皇帝就只顾自己私立金库，必然会造成“士卒怨望，无复斗志”的恶果，于是上疏劝德宗不要只顾眼前，因小失大，应当撤消“琼林”、“大盈”二库，消除“失邦”、“饵寇”的祸根。由于这篇文章指陈利害，剴切动听，反复曲畅，委婉陈情，终于打动了封建君主，取消了这两座金库。又如陆贽代德宗起草颁布的《奉天改元大赦制》^㉕，也是一篇以情动人的著名文章。他以德宗的口吻，检讨皇帝自己的过失，痛心罪己；原谅叛军将士的过错，言辞恳切。诏书一下，感动了大批官兵，“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㉖。此诏对于平息泾原兵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陆贽之所以能够“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㉗，凭的就是一腔真实感情，一副火热心肠。陆贽在文章中抒发真情实感，不仅开了公文写作的新风气，使原来格式呆板、

言辞枯燥的公文得以跻身于文学殿堂，而且对古文运动向缘情方向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的那些感情充沛、文情并茂的著名文章实在可以与古文运动中产生的佳作相媲美。

“不平则鸣”也是古文运动的理论中心之一，这一口号是韩愈在贞元十九年（803）所写的《送孟东野序》^①中提出来的。“不平则鸣”这一命题在理论上的意义，除了不平的生活遭遇触发创作动机这一层含义外，所强调的另一层含义，实际上就是要求文学创作必须抒发真情实感。胸有不平，不鸣不快。假若不是抒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切身体会、真情实感，那么所谓的“鸣”也就失去了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不仅为自己鸣不平，更要为百姓鸣不平。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既要有真情实感，又要表现时代精神，和时代密切联系，把文章作为向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武器。从这个意义上看，把陆贽作为“善鸣其不平”者，他是当之无愧的。面对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弊端丛生的朝廷内政，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陆贽怀着忠君、爱国、忧民的深切感情，奋笔疾书，大声疾呼。可以说，他的每一篇奏草奏议，都是他胸有不平的产物，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斗争。他的这种精神直接影响了韩愈。如韩愈贞元十九年所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②，文中言及此年京畿旱情状，甚为详尽，为民请命的恳切之情，溢于笔端，与陆贽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一文如出一辙。韩愈写文章以“明道”为己任，然而也如陆贽一样，并不板着脸孔说教，给人冷冰冰的感觉，而是以极大的热忱，以真挚的感情，反复陈说，剀切婉曲，字里行间充满着发自内心的真情。所以，古文运动虽不自韩愈始，却由韩愈蔚为大观；“明道”主张虽不唯韩愈提，而韩愈却最具代表性。这种笔下有情的创作方法，可以说是使韩愈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这方面，陆贽“真意笃摯”的文章对他的影响不可忽视。

四、“运单成复”与“文从字顺”

自六朝以来，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不用四六骈文写成。这种文章往往由于堆砌华丽的词藻，玩弄繁密的典故，限制声调的平仄，而造成文风的萎靡和形式的僵化，妨碍了真实地反映现实事物和自由地抒发思想感情，形式成为了表达思想的桎梏。为了自由发挥政论，从容表情达意，陆贽对骈体文进行了大力改造。王闿运认为，陆贽写骈文的办法是“运单成复”^③，即用散文的句法来写骈文，不拘严格对偶，不用生僻典故，不尚华辞丽藻，做到了明白晓畅，流利通达，不见排偶之迹。范文澜先生认为：“唐朝四六文作者，能摆脱拘束，自由发挥政论，只有陆贽一人。”^④陆贽的文章说理尖锐而又婉转，言情激切而不浮躁，既保存了骈文节奏感强、排比铺张、抑扬铿锵的特点，又有一种明白晓畅的新气象，可以说，只差一步就可与散体完全合而为一了。通读陆集，在那些骈整的句法中，能感觉到一种疏宕的气势，如转动圆环，婉转流利，无丝毫涩壅阻滞。他使用辞藻虽也铺设，但不繁缚艰深。如《论关中事宜状》^⑤、《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⑥等文，都是以洋洋洒洒的辞藻，夸张形势，引证古今，陈说利害，表现了他雄富的才华和强健的笔力，但文章并无堆砌之迹和做作之处。由于词语朴实、词句流畅，所以越是反复陈说，义理更显示丰足，说理越发透辟，而不使人生厌。瞿兑之先生认为，陆贽“不用典”，“少用成语”，“纯乎用浅显和平的句调陈情说理，以求动人之听”，因此“他的文格在文学史上极占地位”^⑦。他对骈文进行改造的巨大功绩，他这种以流走的气势、流畅的语言构成的文格，

对韩愈及其追随者创作“文从字顺”的古文有着深刻的影响。

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提出“文从字顺各识职”的主张^⑧，要求行文通顺自然，措词用字妥当，表情达意准确，这是古文运动对创造新体古文的具体标准之一。这一主张来自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的要求。在理论上，韩愈要用散文来彰明古道，必须将古道与古辞加以分别。他在《题欧阳生哀辞后》文中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⑨这就是说，韩愈学习秦汉文章的目的在于学习古道，而不在于学习文辞字句。在《答刘正夫书》中，韩愈更明确地提出了“师其意，不师其辞”的明确主张^⑩。在这种理论主张指导下，在创作上，韩愈一方面声明“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又提倡“唯陈言之务去”^⑪，总之，要一空依傍，“能自树立，不因循”^⑫，从而“自成一家新语”^⑬，而另一方面，韩文实际上又得力于“陈言”不少。刘熙载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唯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⑭王安石也批评韩愈说：“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⑮所以，韩愈“陈言务去”之“去”，应该理解为“扬弃”而不是“抛弃”。考察韩愈的创作，他也写了不少四六骈文，如元和九年（814）替韦贯之作作的《为韦相公让官表》^⑯，就是一篇标准的四六骈文。曾国藩评说：“韩公为四六文，亦不厕一俗字，欧、王效之，遂开宋代清真之风。”^⑰其它如《为裴相公让官表》^⑱，李光地评说：“韩公虽于俳句之文，而辞之质直、气之动荡若此，所谓拨去其华、存其本根者。”^⑲此说认为韩愈对骈文也进行了“拨去其华、存其本根”的改造工作，很有见地。在这方面，陆贽对韩愈的影响是十分显然的。且不说以上所引韩愈用骈体写的文章辞气文格同陆贽奏议十分近似，显而易见是仿效宣公笔法；即如韩愈的《进学解》^⑳诸文，亦骈亦散，既气势磅礴，又流畅自然，不也同陆贽的文风在风貌气质上十分近似吗？所以曾国藩评说：“骈体文为大雅所羞称，以其不能发挥精义，并恐以芜累而伤气也。陆公则无一言不对，无一字不谐平仄，无一联不调马蹄。而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退之本为陆公所取士，子瞻奏议终身效法陆公。而公之剖析事理，精当不移，则非韩苏所能得。”^㉑总之，韩愈在将三代两汉之文改造成新体古文的过程中，从骈文中也吸取了其精华的部份。陆贽改造骈文而形成的明白晓畅的新文风，对古文运动所提倡的“文从字顺”、“章妥句适”^㉒的表现方法所产生的良好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陆贽的文风对韩愈及其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产生过良好影响，所以历史上的有识之士往往都不把陆贽作为骈体文作家看待，而把他划入散文家之列。如欧阳修、宋祁不喜骈文，所修《新唐书》，例不收排偶之作，而独录取陆贽的文章十余篇；清张之洞作《輶轩语》，为后学指点治学门径，特将陆贽列入古文家内，认为其文章“虽多排偶，不得限以四六之名”；近人高步瀛的《唐宋文举要》，甲编选散文，乙编选骈文，严谨有法度，而陆贽的《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赫然列在散文类。可以说，陆贽的文章形式上是骈体，而实质上却与古文运动所倡导的理论有许多共通之处，他的文风对古文运动、对中唐以后的文风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所以我们不仅要肯定他对骈体文的解放和改造之功，还不应该抹煞和埋没他对古文运动的开拓之劳，应该在文学史上给予其应有的评价和地位。

注释:

- ①《嘉祐集》卷十一。
- ②《东坡集》卷二十四。
- ③《山谷诗集注》卷十四。
- ④《鸣原堂论文》卷上。
- ⑤《廿二史札记》卷二十。
- ⑥《昌黎先生集》卷十七，四部各要本。下同。
- ⑦⑧《顺宗实录》卷四。
- ⑧《旧唐书·陆贽传》。
- ⑨《唐陆宣公集》卷十二，四部丛刊本。下同。
- ⑩《唐陆宣公集》卷十三。
- ⑪《唐陆宣公集》卷十九。
- ⑫《昌黎先生集》卷十四。
- ⑬《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毗陵集》卷十三。
- ⑭《补阙李君前集序》，《全唐文》卷五十八。
- ⑮《昌黎先生集》卷十一。
- ⑯刘禹锡《艺概·文概》。
- ⑰⑱《唐陆宣公集》卷十七。
- ⑲《唐陆宣公集》卷二十。
- ⑳《唐陆宣公集》卷二十二。
- ㉑《致堂读史管见》卷二十三。
- ㉒《读通鉴论》卷二十四。
- ㉓《四库简明目录》卷十五。
- ㉔《唐陆宣公集》卷十四。
- ㉕《唐陆宣公集》卷一。
- ㉖《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劄子》，《东坡奏议集》卷十三。
- ㉗《昌黎先生集》卷十九。
- ㉘《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七。
- ㉙《王心》。
- ㉚《中国通史》第四册。
- ㉛⑳《唐陆宣公集》卷十一。
- ㉜《中国骈文概论》。
- ㉝《昌黎先生集》卷三十四。
- ㉞《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二。
- ㉟《昌黎先生集》卷十八。
- ㊱《答李诩书》，《昌黎先生集》卷十六。
- ㊲《答刘正夫书》，《昌黎先生集》卷十八。
- ㊳《新唐书·韩愈传》。
- ㊴《艺概·文概》。
- ㊵《韩子》，《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十四。
- ㊶⑳《昌黎先生集》卷三十八。
- ㊷《求阙斋读书录》卷八。
- ㊸转引自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
- ㊹《昌黎先生集》卷十二。
- ㊺《鸣原堂论文》卷上。
- ㊻《韩文公墓铭》，《皇甫持正文集》卷六。